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 汪振城 主编

T

he Film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27-193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金资助项目

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 (1927-1937)

顾倩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汪振城 主编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 09YJC760048)

The Film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27-1937

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 (1927—1937)

顾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 1927 ~ 1937/顾倩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10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汪振城主编)

ISBN 978 - 7 - 5043 - 6238 - 4

I. ①国… II. ①顾… III. ①电影事业—管理体制—
研究—中国—1927 ~ 1937 IV. ①J9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7835 号

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 (1927 - 1937)

顾倩 著

责任编辑 毛冬梅
装帧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谭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8 (千) 字
印 张 20. 7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6238 - 4
定 价 4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彭少健 项仲平

主 编 汪振城

副主编 吴荣生 卢 炜

聪之知远，明以察微

——影视艺术研究丛书总序

《史记·五帝纪》中如是说“聪之知远，明以察微”，意思为听觉灵敏的人能听得远，视力好的人能看到微小的东西。影视艺术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年轻艺术样式，它既是现代科技和工业的产物，也是人类艺术发展演变的结晶，随着它的蓬勃发展，影视艺术文化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阈之中。因此，对研究者来说，如何做到耳聪目明，既要仰观宇宙之大，又能俯察秋毫之末，显然，这是我们每个影视艺术研究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电影于1895年在西方诞生后，很快就传入中国，1905年中国拍出了戏曲片《定军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迎来了电影史上第一个高潮，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又焕发出新的生机，赢得世界电影界的关注。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提出，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电影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蓬勃发展的世纪之路。至于电视，1958年，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电视的创生。从那个时候起，发展至今，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电视无论是电视台的数量、电视覆盖面积，还是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第一大国。现在，电视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和娱乐形式。

随着影视艺术创作实践的日益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工作者（包括许多学者）对影视艺术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加强，影视研究早已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重要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初步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主要有这么几大类：一是影视实践一线人员的论文和著作，二是高校教师为配合影视传媒教育而编著的大量教材，三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教师等专家学者的论文和著作。显然，这些成果与以往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工作经验性总结多，十年磨一剑地潜心于基础性、学理性的系统研究较少；实用



性技术类的教材及经验杂谈式的东西多，理论性的深度探究较少；对西方研究成果的介绍以及对影视产业之运作策划较多，结合本土文化艺术美学的优秀传统来研究影视艺术美学之基础理论的较少。影视艺术理论研究的这一状况与当下中国日益蓬勃的影视艺术生产以及作为经济大国的强劲崛起都是不相适应的。

值得一提的是，建校三十多年而崛起于本世纪初的浙江传媒学院近10年来汇聚了大量来自海内外的影视创作（制作）及研究人才，其中作为该校二级学院的影视艺术学院就有专职教授十余名，副教授二十余名，博士25名，可谓群英荟萃。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全国各级各类高校影视艺术类专业教育四处开花，近乎失控的情况下，作为一所具有几十年办学历史的院校，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份清醒，谨防为一时盲目的扩张而无视（甚至放弃）影视艺术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而沦为办学“作坊”。为了进一步提升办学层次和品牌，增加软实力，同时受我院专家学者们长期以来心无旁骛、潜心钻研、严谨治学精神的感动，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影视艺术研究丛书。承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厚爱，承蒙浙江传媒学院领导的支持以及影视艺术学院学者们垂青，本丛书今天得以顺利问世，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本着“坚守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计划在今后的三至五年中推出专著约20本，对我们来说，这些成果既是本学院学者们前一阶段潜心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也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新起点。它们在形式上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博士们毕业论文修改后的论著，另一部分是本院教师的新著。

唐朝韩愈《进学篇》中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论著的出版都凝聚着研究者多年冷板凳的清苦和知识分子的操守。影视艺术文化的红红火火与研究者的平淡恬然形成冰火两重天的反差，但我们知命、认命，识微知彰，秉烛前行，希冀以有限的光照亮来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影视艺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

影视艺术学院丛书编委会

2009年春·杭州

前言

如果将民国社会文化比作一条寒冬中泥泞的大道，各种思想道路和意识形态是这条大道上纵横交错，杂乱而又各自清晰的车辙，当时政府建立的众多行政系统比作大道上驱驰的诸多马车，那么电影管理体制貌似当中相对较新的一辆，或许装饰堂皇，但却没有例外地一边车轮陷入民族主义的车辙，另一只轮子陷入“教育主导”（亦为传统中国“文以载道”之变相延续）的车辙。车顶上张扬着一高一低两部旌旗，高者印有“消极管束”，低者印有“积极引导”，在狂风中猎猎做声。这辆马车歪歪扭扭，然而却坚定地按着既定轨道前行着，行向了那苍暗的远方，消失在暮色之中。这部马车，在众多的香车宝马中并不见得起眼，然而它的道路与轨迹，却可以作为此期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外生后发现代化进程相当重要的表征。

本书试图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体系，描绘1927~1937，南京国民政府所建构的电影管理体制，并不是之前普遍认为的仅由政府单方操纵，只体现执政意志，而是以当时中国社会所广泛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为重要基础，兼及“教育”（训育）“大众”的思想，同时由政府—知识阶层双方的共同意愿推动建立，很多时候又得到了来自电影业界的助力，呈现出一种间杂进步与消极的复杂面相。本书作者的这种努力，常常为史料难觅的硬伤所牵扯，不知是否成功，然而对这一思路，却持相当的自我认同。

本人沿袭首段马车之想象，试分全书为四大部分，分别是：吾欲造车、新车之造、威武之外饰、未竟之内厢。

第一部分《吾欲造车：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成因》，共分四章，试图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入手，分析塑造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与理念的原因。这个“吾”，自然是指当时包括国民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

第一章“四方力量的博弈塑造了中国电影的形貌”，分析自国产电影开始发展以来，中国国内的三支力量，即政府—知识阶层—电影业界，外加一支外来电影势力，这四方力量的博弈塑造了中国电影的总体形貌；第二章“中国电影的发展与官方介入电影管理的关系”，阐述由于中国电影业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引发社会就电影管理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和零星



的自发检查, 社会舆论要求官方介入电影管理的呼声高涨, 应运而生了北洋时期的电影检查实践, 政府与知识阶层在此达成初步一致, 为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建立的电影管理体制打下基础; 第三章“电影界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 通过外国电影势力对中国电影的深刻影响促发了民族意识, 留学生进入影界催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等分析, 推论出电影业界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是导致业界支持建立消极管束为主的官方电影管理体制的原因; 第四章, “国民政府电影认识分析”, 从中华民国与中国电影的内在民族主义关联、政府与电影业界均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契合、党政人士的电影功能认识、国民政府的电影管理认识等四个方面, 来分析论证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立背后的支配思想乃是以电影实现新民训育, 从而为建设民族国家总体任务服务。

第二部分《新车之造: 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建设》。新车建造, 无疑是最繁难的程序, 既要无中生有, 又要由有致优。因而本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于第一部分的基础上, 以电影检查为中心, 描述 1927~1937 年间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立与形成的基本过程, 共分四章。

第五章“统一电影管理行政: 努力与阻力并存”, 主要论述: 统一电影管理行政是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设初期的主要目标, 其过程表现为努力与阻力并存。国民政府建立电检行政体系,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与地方电检机关的关系问题, 这当中最关键的又是与上海地方电检机构的关系问题。电检行政上中央集权的成功, 与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的过程密不可分。

第六章“初期尝试”和第七章“初次实践: 内教二部电检委的建立”为具体电影管理体系建立过程的描述: 1929 年内政部颁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3 条, 随后与教育部合作将其修订为 16 条规则, 地方上据此建立了检查机关。从 1929 年到 1931 年内教二部电检委建立前这段时间, 是为国民政府电检制度的初期尝试阶段, 主要以上海为电检行政的实验室。1930 年年底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 1931 年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内教二部电检委, 此为中央政府主管电检行政的初次实践。内教二部电检委时期, 确立了包括检查程序的规范建立、人员配备、系列法规配套等在内的国民政府时期电检行政总体框架。

电检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 分别对诲淫海盗电影、武侠神怪电影、辱华电影、方言电影进行了打压, 促进电影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获得了相当的知识阶层支持和部分的业界支持。另外, 对左翼电影的打压则呈现出了电检制度天生具有趋于社会思想文化控制的消极负面。

第八章“集权倾向的加重：中央电检委的建立”主要论述：由于国民党党务和行政系统的固有矛盾，党务人士发动以“艺华事件”为中心的系列事件，并通过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剧本审查委员会等机关的建立为铺垫，将内教二部电检委改组为中央电检委，从行政系统手中夺取了电检权。这既是党务系统对行政系统的胜利，也是国民党对全社会加强集权管理的一种体现，由此，电检行政也开始转向，展露出其压制民主的负面效应。但在中央电检委时期，除了加强思想管束外，仍通过对外国电影在华活动的控制和加强打击辱华片，延续了内教二部电检委时期确立的扶掖国产电影的基本思路，为维护民族电影做出了努力。这是由电检制度建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基础决定的。

第三和第四部分阐述国民政府在以电检事务为中心的电影管理体制建立后，依托前后二任电检委和有关机关，通过对外、对内电影政策制订和实施，为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其根本指导思想，仍是民族主义与强调电影教化功能。

第三部分《威武之外饰：国民政府对外电影政策与实施》，之所以称之为“威武”，也算是对此期对外电影政策的成效有基本认同。不考虑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与美结盟因素，就这段时间来说，如果不是政府电检机关不断对各种电影中包含的辱华因素进行抵制和反击，美国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对华电影制作上的错误，更不会主动更正，银幕上的负面中国人形象将持续更久。本部分共分五章，分别涉及辱华电影问题、中央制止辱华片和其他外片的举措、通过限制外片保护国片问题、外人在华摄片问题、主动对外宣传等5方面。第九章“辱华电影问题”，首先对辱华电影进行界定和分析。其次，剖析中国社会对辱华电影认识的时代变迁特色。国人的辱华片判定总是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紧密结合，故而开始建议政府施行进口电影检查、外交干涉、国片出口检查、强调通过积极引导和主动对外宣传等手段消除辱华电影的产生。前期的民间抵制效果不佳证明，在辱华片问题上，必须要有官方力量介入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事实上，辱华片数量的逐渐减少，与国民政府通过对外电影政策长期的努力密不可分。

第十章“制止辱华片和其他外片的举措”，主要阐述租界电检权的存在对中国统一电检行政的影响，政府制裁辱华电影的具体过程，以及政府其他各种手段消除辱华电影摄制的努力。

第十一章“通过限制外片保护国产影业问题”，所谓限制外片主要手段为加大对外片的检查收费和罚款力度、对各类电影文字进行规定。

第十二章“严格监控外人在华摄片”，探讨该问题的出现及制订对策的



过程,包括首订、修订、对外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漫长而细致的再修订等,最后分析上述措施所体现的实施效果。

第十三章“主动对外宣传”,分析对外宣传意识产生的复杂原因,特别指出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由主张拍摄面对现实的电影转向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因,进而采取限制包含负面因素的国片出口,并由官方制作正面宣传的影片、设置海外宣传机构来推动海外电影宣传等手段以追求正面宣传意图。

第四部分《未竟之内厢:国民政府对内电影管理的各项举措》,“未竟”,一是历史层面的,二是本书层面的。历史层面上来说,由于禁绝武侠神怪片导致此类影片制作机构南迁,加之抗战后无力管束,此类影片的禁绝虎头蛇尾。而方言影片的禁绝,由于更多来自政治利益推动而非社会需求,因而意义较小,成效也较小,同样由于制作机关的南迁而宣告失败。至于本书层面,则在于对内电影管理中涉及的“左翼电影”或曰“新兴电影”问题,涉及更多层面,更复杂的意识形态辨析,更多的史料收集工作,暂时不在本次撰写范围内,将来欲施以更细致的规划完成。本部分主要由二章组成:以反对迷信之名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以推行国语之名禁摄方言电影。

第十四章“以反对迷信之名禁绝武侠神怪影片”,首先分析1928~1931年武侠神怪片热潮生成之原因,包括社会舆论对武侠神怪片的各种评价,从而与政府禁绝武侠神怪片之用意相联系,带出第三节对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之过程与打压小公司之关系的分析。本节以“禁绝神怪武侠影片的滥觞:禁映《火烧红莲寺》”的专题分析为结语。

第十五章“以推行国语之名禁摄方言电影”,首先分析推广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建设的关系,其次阐述国语运动在电影中的体现,接着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商业因素”三方面来分析中央禁绝方言影片的原因,最后略论其他方言电影情况。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了国民政府放弃禁绝方言声片的政策。

结语:对全书进行总结,并点出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

此书目前的状态,史不算史,亦非完善的系统研究,仅可算作力求接近当年本相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与“真实的渐进线”之间的距离究竟属于聚少离多还是差强参差,不经时光检验,尚未可知。就个人表达之“愿意”与“能够”而言,之间的差距亦不在少。暂且将本书之出版视为本人学术途路上的一次深呼吸,好整理思路继续潜行。

二〇一〇年孟夏于杭州

绪论

1

第一部分 吾欲造车：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成因

17

第一章 四方力量的博弈塑造了中国电影的形貌

18

第一节 国内的三支力量

18

第二节 外来力量

19

第二章 中国电影社会影响的扩大与官方介入电影管理

24

第一节 中国电影的成熟与社会影响的扩大

24

第二节 社会关于电影检查的讨论与实施

31

第三节 北洋时期电影管理实践

42

第三章 电影界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

48

第一节 外国势力对中国电影的压制促发了业界民族意识

48

第二节 留学生进入影界催生了民族主义思想

57

第三节 电影界民族主义思想的初现

59

第四章 国民政府电影认识分析

69

第一节 “乡愁”：中华民国与中国电影的内在民族主义关联

69

第二节 官方与电影界民族主义思想的契合

71

第三节 党政人士的电影功能认识

78

第四节 国民政府的电影管理认识

88

第二部分 新车之造：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建设

95

第五章 统一电影管理行政：努力与阻力并存

96

第一节 电影行政权归诸地方的尝试与取消

97

第二节	与各地行政机关发生的纠纷	101
第三节	政府机关之间争夺电影管理权	105
第四节	政府与党部的角逐	111
第六章	初期尝试	117
第一节	国民政府电检体制设计的思路变迁	117
第二节	以上海地方电影行政为中心的检政实践	120
第七章	初次实践：内教二部电检委的建立	133
第一节	电检委机构与检查程序的建立	133
第二节	组织规定与人员情况	136
第三节	电检系列法规的建立	137
第四节	电影检查领域内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剧	148
第八章	集权倾向的加重：中央电检委的建立	166
第一节	准备工作	166
第二节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	170
第三节	中央电检委之结束	184
第三部分	威武之外饰：国民政府对外电影政策与实施	189
第九章	辱华电影问题	190
第一节	辱华电影问题解析	191
第二节	中国社会辱华电影认识的时代变迁	195
第三节	外国限制他国电影之启示	204
第四节	民间抗议的效果	207
第十章	制止辱华片和其他外片的举措	208
第一节	租界电检权的存在对统一电检行政的影响	208
第二节	制裁辱华电影	215
第三节	通过其他手段消除辱华电影摄制	217
第十一章	通过限制外片保护国产影业问题	224
第一节	加大对外片的收费和罚款力度	225

第二节	对各类电影文字的规定	229
第十二章	严格监控外人在华摄片	232
第一节	问题的出现	232
第二节	讨论对策的过程	235
第三节	实施效果	246
第十三章	主动对外宣传	248
第一节	对外宣传意识产生的原因	248
第二节	以参加海外影展为推动的电影对外宣传活动	257
第四部分	未竟之内厢：国民政府对内电影管理的各项举措	259
第十四章	以反对迷信之名禁绝武侠神怪影片	260
第一节	有关武侠神怪片的社会舆论	262
第二节	政府禁绝武侠神怪片之用意	267
第三节	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与打压小公司	267
第四节	专题分析：禁绝神怪武侠影片的滥觞——禁映《火烧红莲寺》	272
第十五章	以推行国语之名禁摄方言电影	279
第一节	推广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建设的关系	280
第二节	电影中的国语运动	283
第三节	推行国语之外别有深意——粤沪宁三方的多重博弈	290
第四节	其他方言电影情况	299
结语		301
主要参考文献		303

绪 论

克莉丝汀·汤普森和大卫·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提出，“电影史不仅仅只是电影的历史”，而且“为我们打开了有关政治史、文化史和艺术史（无论高雅艺术还是通俗艺术）的无尽的话题”，“作为一个相对而言仍非常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最多不超过三十年），电影史的学术规范和秩序亟待建设，而这种建设是充满挑战性和刺激性的。有待探索的问题远多于现成的答案，历史的不确定性远多于绝对性。仍然有那么多的问题有待我们的发掘……那么多观照研究课题的新视野、新方法……我们确信，在今天，电影史的研究是人文学科范围内最具有活力和生气的研究领域之一”，“电影的历史不是只有一种写法而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视野和角度”，而“最具有趣味的历史问题肯定会是跨越类型的疆界的”。^① 因此，本书力图跨越传统的艺术发展史领域来剖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官方电影管理体制，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视野来看待该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学科发展与史为镜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语境下，电影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于电影美学、电影艺术学，这多半是一种对之前电影被迫成为政治意识形态附庸与传声筒的反拨，也是对电影研究原本应有重心之回归：电影研究确实应该以电影艺术为中心。然而此后的二十多年来，电影研究过于集中于艺术

^① [美] 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陈旭光、何一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导论第 2、17、18 页。



研究，电影美学、电影艺术学被推上了圣殿^①，诸如电影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行政学等却一度不入主流电影研究者法眼。这种状况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大改变，电影研究的各个领域不断开拓，各个领域不断交融，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方向，如电影观众学、电影制片学、电影法学、电影与视觉传媒研究等等。

然而在研究疆域的急速拓展中，有一些领域依然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在电影史研究领域的官方电影行为与机制的研究，依然鲜人瞩目，历史上所存留的多是对其禁锢性之怨诉，对其意识形态化之嘲讽。这固然是对数十年来意识形态强迫艺术为婢女之矫枉过正，但也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崇尚清淡的自诩。例如关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电影行为的描述，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莫过于纸上飘零的只言片语如“影片……通不过影片检查机构的审查。……即使剧本通过了，也未必拍得出来，拍出了也未必能公映，一审查，多半把影片剪掉百分之几十，弄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②——似乎当时政府对电影所能做的仅有审查和修剪，并且这种检审是愚昧而无常识的，纯属压制性质。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正如今日中国国家电影局每出台一项电影政策都会深刻影响中国电影面貌一样，当年国民政府采取的每一电影举措都对电影业影响甚巨，到底发生了何等影响值得仔细研讨。然而之前对此关注的学者寥寥可数。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影是否应该分级的热烈讨论，现代国家电影管理体制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领域，然而关于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研究，由于属于历史领域，不太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依然门庭冷落。况且对于钟情艺术缪斯的研究者而言，出自官方的任何作为皆属保守僵化，带有党派色彩，不入法眼。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冷落的原因，但正如李少白所言“不管电影艺术家和评论家如何不喜欢谈论电影与政治的关系，与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的关系，但它们都会关心你”，“问题不在于承不承认存在这些关系，而是如何恰当地处理这些关系”^③。

清理国民政府官方电影行为与决策的起因、发展、建立，进而梳理出一个大致成型的电影体制，其现实意义其实是显著的。例如，今日的分级制虽经千人呼吁、万首翘盼却迟迟不能出台实施是为何因？中国人如何看待色情、暴力与电影中其他负面因素？分级制会牵涉电影之外的哪些社会层面？其他社会领域甚至思想领域需要对分级制做何适应与调整？或者真

① 如中国唯一的国立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其影片分析教材命名为《走向电影圣殿》。

②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序言”第9页。

③ 李少白：《电影历史及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如官方所说，是分级制不适当当前的中国社会，实施分级制必须待时机成熟？欲理解这些问题，完全可以从追溯民国时期中国人电影认识开始，如：官方电影检查制度之生成是否纯为政府需要和推动？其生成究竟对中国电影产业乃至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多大影响？正或负或正负兼有？如何产生？如何变化？社会或业界在当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当这种制度开始成为阻滞性力量时，国民政府为何不能做出及时的调整 and 适应？这些鲜人论及。而整个官方电影管理体制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历史中到底应予以何种评价尚少有探讨。

英国历史学家 R. H. 托尼提出，要了解现在某些“裂缝”（特殊现象）的含义，我们必须下到历史大厦的“地窖”里去寻找其基础，分析大厦的“裂缝”意味着永恒还是偶然的因素。“我们时代的世界特征是从过去的环境与精神中成长起来的”，历史记载了人类的发明创造及其成就，这些成就的意义往往只有到后代才能真正意识到。随着历史进程逐步明显地揭示出来，过去有过但未曾实现的观点和计划也许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思考^①。

提出中国中心史观的美国历史学者柯文曾经说过，“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②。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互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我们要从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③中选择并探索其真意。事实的选择以及赋予其何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定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同时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关切的事物不同，反映这些关切的问题和前提假设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世代的史家都得把前一代史家所写的历史重写一遍^④。因而民国电影似乎从诞生以来就不断被重写，但却始终处于书写的进程当中。

以史为镜并不意味着历史一定能提供直接经验，“因为着意于寻找历史的先例往往会强调表面的相似，而忽视时代的本质差别”，重要的在于通过识别过去的趋势来推测未来。历史不为类比性预测提供依据，“却可以发现政治、社会、经济的某些因素如何向未来发展”^⑤。对电影史的政治、经济、

①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4、85页。

②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前言”第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41页。

⑤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3、84页。



社会等因素的梳理分析，不过是要将混杂在电影现象中的这些支离探明，从而才能回到电影这个合力场中来看电影史自身。这些因素之清理不过是补上建构电影史时应有的工作，未必属于电影史本身，但只有这些遗漏的工作补成后，中国电影史才得以真正成立和深化。

前人所言及所未言

· 早期中国电影相关史述情况

中国电影史现有研究中，涉及国民政府官营电影管理体制研究的论著不多，且较为零散，现能见到最早的专著仅有戴蒙撰著的《电影检查论》（1937年）一书。但该书主要停留在罗列各国和中国电影检查情况，再加以简单评价的层次，并且非常明显是为政府实行电影思想统制服务，并未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

· 现当代中国电影相关史述情况

虽然近年来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成果堪称丰硕，但是当代现有电影史述中，涉及国民政府官营电影管理体制研究的论著仍然不多而零散。除了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年）和台湾杜云之的《中华民国电影史》（1988年）等书中零星提及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外，基本没有专著，所以仅可通过论文来考察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在CNKI上以“电影检查”、“电影管理”为检索词进行检索的方式来进行直观的判断。

首先以“电影检查”为题名进行包括期刊、博士、硕士论文等在内的7大库的跨库检索，共检出23项结果，其中13条为汪朝光有关电影检查的论文，包括《民国电影检查制度1911~1937》、《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等等。另有《浅议1927~1937年的中国电影检查制度》、《从民国早期的电影检查制度看对其三民主义的贯彻》、《汪伪政权的电影检查制度》、《香港实行电影检查新条例》等单篇论文，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篇《民国电影检查制度（1911~1937）》（2006年）、《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研究（1941~1944）》（2007年），以及错误结果2篇。

若以“电影检查”为主题，同样进行跨库检索，将出现134条记录，以其为关键词检索，出现记录92条，其中多半是医学电影检查论文，其次为与当前电影检查有关的新闻报道，关于官方电影检查研究的结果依然与上雷同。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研究国民政府“电影检查”的成果，主要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汪朝光的系列论文，以及少量硕士论文。

而以“电影管理”为检索词，无论采取何种搜索方式，所获得的一百多